

# 在北京数鸳鸯的人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

►2025年12月，志愿者在北京颐和园进行鸳鸯调查。

鸳鸯，雁形目鸭科，中型的树栖水禽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。

在中国文学中，鸳鸯被反复吟诵，往往被用来形容长相厮守的有情人。早在《诗经·小雅》中，就曾留下过“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”的美好诗句。中国人从古至今的生活里，鸳鸯图案和造型不断出现在器物上，从艺术作品到生活用品，不一而足。

在我国大部分地区，鸳鸯是候鸟，相当一部分在春夏到北方地区繁殖，冬季迁往南方。曾经，在北京越冬的

鸳鸯被视作“罕见冬候鸟”，数量极为稀少。不过，这几年很多北京市民都留意到，在冬天的湖面上不时能看到鸳鸯。

从2018年起，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、宣武青少年科技馆等机构发起之下，每年冬天，大量北京市民参与到鸳鸯调查工作中。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北京越冬的鸳鸯数量正成倍增加。

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，不期然间，北京城里多了许多热爱鸳鸯、热爱鸟类的普通人。

带来获得感，也要求责任感

志愿者在科学调查中成长

每年的鸳鸯调查，基本形式都是在冬天的三个月开展三次同步调查。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，三次调查分别在2025年12月20日、2026年1月17日和2月15日的下午2至3点进行。

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科研宣教科科长张亚琼告诉记者，今年冬天鸳鸯调查的峰值出现在1月，共记录鸳鸯1773只，较去年同期总数增加750只。“这几年下来，总体数量翻了大约3倍，从最开始调查时的每年四五百只，到现在每年常态化的1000多只。”

颐和园调查点组长杨开颜，见证了鸳鸯调查的8年。2018年，鸳鸯调查一启动，她就加入其中。此前，这位中学数学老师就已多次参加动物保护宣传活动。

一份2018年底的调查报告，记载着颐和园调查点最初只有11只鸳鸯。最近几年间，数量不断增加，杨开颜对日期和数据如数家珍——2023年12月，71只；2024年2月，88只；2025年1月91只；今年1月，168只。不但如此，鸳鸯分布区域也在变广，最初只能在颐和园团城湖和颧凤桥两处发现鸳鸯，如今面积大大增加。

当然，也不是每个调查点、每一次调查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今年的鸳鸯调查，最后一次设置在2月15日，除夕前一天。随着天气变暖，鸳鸯变得分散，调查难度增加。最终，龙潭湖公园的志愿者们一只鸳鸯都没有发现。不过，其他志愿者们在群里打气：“（没有发现）一样有价值！”

参与调查，对志愿者们来说，既多了一份责任，又有难以想象的收获。

在杨开颜影响下，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一直参与鸳鸯调查。尤其是孩子，从小学二年级一直跟到现在，在对鸳鸯年复一年的调查中长大。即便学业压力日增，女儿杨雨琛也坚持要继续参与，“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份工作、一种责任。”

不知不觉间，杨雨琛成了自然爱好者，人与自然的也成了母女两人闲聊时的重要话题。“走在路上，孩子听见鸟叫就习惯抬头，一路数着白头鸭、乌鸫，还会告诉我北京有多少种啄木鸟……我总觉得，鸳鸯调查产生了‘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’的影响，让孩子逐步地了解自然，更加热爱自然。”

对杨开颜自己来说，鸟类也成了一种陪伴。“有时候走在颐和园里，看着鸳鸯和很多其他的鸟，就觉得人在这世上不是孤独的。人和周围的生物处在和谐的关系中时，感觉总是充满灵动。”

“我们的很多小志愿者，在调查中开始对野生动物保护产生兴趣，有的已经认真准备大学报考相关专业了。”张亚琼说，通过搭建调查平台，让很多市民自觉积极参与进来，关注身边的野生动物，作为组织方也感觉意义非凡。

“有时候我觉得是志愿者们在推动着我们把这项工作做下去。”张亚琼说。“每年到了11月，很多志愿者就会在群里说，调查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们充满期待，于是我们就一直坚持了下来。”

▼北京玉渊潭公园的鸳鸯。

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

既容易观察，又被大家喜爱

鸳鸯成为科普的“旗舰物种”

宣武青少年科技馆生物学高级教师岳颖是鸳鸯调查的发起者之一。她告诉记者，上世纪90年代她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时，各种研究和文献中都称鸳鸯为“北京地区罕见冬候鸟”，足以证明那个年代北京野生鸳鸯数量非常少。

岳颖说，大约在2017年，她带着学生在龙潭西湖公园观察到野生鸳鸯交配的行为，就装了几个巢箱，开展人工招引实验。对于北京地区的鸳鸯数量，她也产生了好奇心。

“我们在公园调查的时候，发现很多游客不认识鸳鸯，经常指着绿头鸭说‘这是鸳鸯’。”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史洋告诉记者，他们观察到，从2015年左右开始，大量鸳鸯开始在北京越冬，再加上此前有北京雨燕调查的经验，于是顺理成章想做鸳鸯调查。

史洋告诉记者，对于鸳鸯调查来说，冬季是相对理想的季节。这是因为，水鸟喜欢集群越冬，而且因为水面结冰，鸳鸯只能聚集在少量有活水的区域，容易开展调查。

过去20多年来，岳颖一直从事青少年科普工作。对她来说，这项科学调查，也是很好的科普机会。

“我们做公众科普活动需要有个抓手，需要有‘旗舰物种’，要选择既容易观察，又被大家喜爱的物种。”岳颖坦言，选择鸳鸯作为调查对象，对志愿者们来说参与门槛比较低。无论大人孩子，培训一下就能上岗。除了鸳鸯调查之外，每年春夏开展的北京雨燕调查，也有类似的特点。

最开始，只有9个调查点，参与进来的大多数是学生们和此前北京雨燕调查的志愿者们。到现在，已经增加到16个调查点。当然，这也依然没有覆盖鸳鸯全部的活动区域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鸳鸯数量正逐年增多，活动区域不断扩大。

紫竹院公园高级工程师翟敬宇很早就关注到了鸳鸯。事实上，上世纪90年代，紫竹院公园就有过野生鸳鸯在这里过冬的记录。

作为长期的鸟类爱好者，翟敬宇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鸳鸯调查这个项目并主动加入其中。在大多数年份，紫竹院公园都是鸳鸯调查统计数量最多的调查点。

很多参与鸳鸯调查的志愿者，自然而然地开展起了科普工作。他们要在调查时满足周围游客的好奇心，不厌其烦地介绍鸳鸯的相关知识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自己的调查一线，在日常散步的公园、水域旁，不断劝阻一些游客的投喂行为。

需要深入研究，也需要细致保护

人类对鸟类表达着更多爱

对于北京的鸳鸯，光统计数字是不够的。从专业研究者到志愿者，都还有许多想做的事。

史洋说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，仅调查鸳鸯个数远远不够，还有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。在北京，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鸳鸯，但其中有的是候鸟，有的可能是留鸟，甚至候鸟中也分冬候鸟和夏候鸟，这些都需要通过佩戴定位器等方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“其实北京鸟类中有很多都与鸳鸯类似，有多个居留型，如绿头鸭、红隼、苍鹭等，但鸳鸯不同居留型的比例我们还不掌握”。

鸳鸯调查本身也在变化。从几年前开始，调查中增加了一项统计，鸳鸯的伴生物种。设计初衷，是希望借此分析鸳鸯对栖息地的选择和伴生物种之间有什么规律。史洋说，这要求志愿者们对水禽有更多的了解。

比如，今年2月15日的陶然亭公园调查中，除了记载6只鸳鸯，还记载了11只绿头鸭、1只乌鸫和1条泥鳅等。从天空到水中，志愿者的眼睛不光盯着鸳鸯。

长期在公园从事园林工作的翟敬宇，从1997年起便开始喜欢上了观鸟。她很早就意识到，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。要想在植物保护中实现绿色防控，保持生态平衡，鸟类作为昆虫的天敌，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鸳鸯的自然巢穴是树洞，但现实是在城市公园中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自然巢穴。甚至，从保护大树和保障游园安全的角度考虑，还要对有些树洞进行封堵。为此，多年前开始，紫竹院公园专门挂了一些人工巢箱，3年前对巢箱调查后发现，许多鸳鸯的确选在了里面繁殖。“我们在不断观察鸳鸯的适应性，后期继续对巢箱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整。”

翟敬宇说，可以为鸳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比如，可以种植些湿生、水生植物，冬天适当种植保留一些芦苇，保留一些不结冰的水面，营造不易被打扰到的生活环境，为它们繁殖期和幼鸟出巢后的生活提供安全感，等等。

翟敬宇说，经过实际调查，一只正常的鸳鸯产卵大约在7枚至13枚，但其中有一部分会孵化不出来。他们特地请教了北京动物园的鸳鸯研究专家，并在鸳鸯孵化跳巢后，对没有孵化成功的卵进行科学研究。

“从公园管理者身份，我也一直在想，尽可能为它们做更多。”翟敬宇说，“从1997年开始有爱鸟意识之后，我一直在想怎么去爱它们，怎么正确地爱它们。”



▲志愿者拍摄的鸳鸯



## 列车长刘鑫——

# 把旅途中的烟火温情写进日记

本报记者 马睿嫻

晨光熹微之时，当K7807次列车缓缓驶出山西大同火车站，车轮与钢轨碰撞出一阵“咣当咣当”声，这是列车长刘鑫最熟悉的声音。K7807次列车还有个名字，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山西大公交”。刘鑫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，封皮已经磨得起了毛边，内页却密密麻麻——这是她的“服务日记”，记录着十年里那些让她骄傲、也让她脸红的瞬间。

翻到2025年9月的一页：“今天做得最好的一件事：6号车厢那位视障旅客张大哥又坐车了。这次没等他开口，我就扶他坐到了座位上。路上告诉他‘今天阳光特别好，如果一会儿觉得晒我帮您把窗帘拉上’，他笑着说‘刘车长，你的声音就是我的眼睛’。这话让我眼眶红了——原来我们多说一句，对有些人就是整个世界。”

翻过几页，是一段用红笔重重圈起来的字：“10月12日，教训深刻。那位带2个

孩子的母亲，我明明看见她手忙脚乱，却只按流程问了句‘需要帮助吗’，她说不，我就没再坚持。结果她在接开水时，孩子差点被绊倒。虽然没出事，但我一晚上睡不着——我问自己：你是在服务，还是在走过场？真正的服务，是看见她不好意思开口的难处。”

正是这些记下的教训，推动着服务的改变。那次之后，刘鑫和同事们反复打磨出“列车服务畅行码”，整合接水、补票等高频需求，旅客扫码即可实时推送。一位

山西老乡留言：“这码子真灵，比在家门口喊一声还管用！”

日记的后半本，是一份“重点旅客档案”：“7号座陈先生，孩子才一岁半，孩子老是觉得饿，路上总会哭闹，餐车中的稀饭适合给孩子食用，遇见他就主动询问提供。”“乘车的中学生，总打游戏忘记下车，到忻州前一定去提醒他们。”每一条需求，都源于日常的观察与倾听。“服务不是完成任务，是用心照亮别人的路。”刘鑫说。

日记里也有暖心的“意外”。11月的一

天，新来的小张只是给旅客指了指开水间的方向，没主动带过去。刘鑫本想批评，却又想起自己刚上班时也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。晚上开了个短会，她没点名，只讲了自己当年因没主动帮一位孕妇内疚了很久的事。说完，小张小声道：“姐，我懂了。”

十年间，慢火车的速度未变，服务却在持续升级：私密的母婴室、安抚孩童的玩具、为学生准备的试卷、售货小车内新增的卫生用品……每项举措皆源于“将心比心”，也源于日记里密密麻麻的记录。

夕阳下，车厢里旅客安然休憩，孩童酣睡，乡亲闲谈，刘鑫翻开新的一页写下：“今天一切平安。那位爱打游戏的中学生，到站前五分钟前乘务员拍了他肩膀，他抬头说：‘谢谢，差点又坐过’。带孩子的年轻妈妈，接过粥时眼睛亮亮的。就是这些小事，我又一次感受到旅客们沉甸甸的信任。”

合上日记本，刘鑫望向窗外。日复一日，慢火车终会到站，但提升服务永无止境。今年，刘鑫有个朴素的愿望，把途中更多的烟火温情写进日记，和同事们成为一束微光，照亮更多旅客的旅途。

